

纪念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 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百周年

光辉的文献，锐利的武器

——纪念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 的作用》写作一百周年

北京动物园工人理论小组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生物学史组

一百年前，革命导师恩格斯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总结了当时科学上的成就，写成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一光辉文献，在这篇光辉文献中，恩格斯历史地考察了人类起源问题，精辟地阐明了劳动在人类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科学地论证了“从猿到人”的历史过程，深刻地揭示了人类产生的根本规律，创造性地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人类起源的理论。

恩格斯这一充满无产阶级战斗精神的光辉著作，为人类起源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是批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尖锐武器。今天我们联系历史和现实的阶级斗争，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创造人的科学论断，对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批判修正主义，回击右倾翻案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自然科学阵地，坚持科学技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人是从哪里来的？围绕着这个问题，斗争是很激烈的。历来剥削阶级，为了麻痹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维护其反动统治，竭力宣扬上帝造人的“神学目的论”。在西方，《创世纪》开头第一篇，就说上帝在几天中就创造了人类和世界万物。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继承了商周以来奴隶主的唯心的“天命观”，认为天（上帝）是万物的最高主宰。西汉董仲舒进一步认为世界万物和人都是“天”有意识、有目的创造出来的。这些都是赤裸裸的“神学目的论”，它同科学是毫无共同之处的。这种唯心的观点，受到了古代进步思想家的坚决反对和批判。战国时期法国荀况认为世界万物的形成，都是物质世界本身发展的结果。他说：“天地合而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天论》）他坚决否定儒家“天命论”关于天有意志的说法，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论》）东汉战斗唯物主义者王充继承了荀况这种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对天有目的生人的说法，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指出人类的产生并不是预先有目的安排的。他说：“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论衡·物势》）由于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尽管这些认识还比较粗陋，但却是朴素唯物主义的，是同唯心的神学

（下接 473 页）

致 读 者

本刊 1976 年第 5 期系 9 月 20 日付印，因故延期发行。现经检查，该期中 459—471 页的两篇文章，不妥及错误之处较多，现已撤掉，目录中的题名亦应删去，特此说明。

中国科学编辑部
1976 年 11 月 10 日

目的论针锋相对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科学知识更加丰富了。在实践中,人们逐渐地积累了有关动物和人体解剖的丰富材料,开始认识到人和动物的亲缘关系。十八世纪法国生物学家布丰就已经指出,应该密切联系动物界来考察人类自身。稍后,1809年,拉马克发展了这种思想,在《动物哲学》一书中,进一步明确指出,生物是进化的,可变的,人类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的。这种正确的认识,虽然由于当时反动势力的压制,以及科学水平的限制而得不到发展,但它却给“神学目的论”以有力打击。

十九世纪中叶,动植物育种的实践和解剖学、胚胎学以及地质学等各部门自然科学的成就,为阐明生物进化规律积累了大量的科学资料。

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科学地阐明了生物界的发展历史及其发展规律,创立了生物进化论,推翻了长期统治生物学领域的“神学目的论”、“物种不变论”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物种起源》出版后不久,恩格斯即写信给马克思说:“……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9卷503页)生物进化论把人的思想从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们认识到整个自然界包括生物界都是变化的、发展的,有它自己的历史。

从生物进化论出发,也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自身也一定是从动物界进化发展来的。达尔文学派的自然科学家通过对人和动物的详细比较研究后,进一步论证了人和猿的亲缘关系。1863年,赫胥黎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中,证明人类是起源于动物的,他详细地阐述了人和动物的关系,提出人猿同祖的理论,确定了人类在动物界的位置。1871年,达尔文在他的《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中,进一步指出,人类是从新生代第三纪末由冰河期高度发展的类人猿进化而来的。1874年,海克尔在《人类起源》一书中,也论述了人类起源的历史,证明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就像猿猴是从其他低等哺乳动物进化来的一样。

达尔文学派的自然科学家,正确地论证了人和猿的亲缘关系,指出了人与猿有着共同祖先,人也是从动物逐渐演化而来的,这就有力地批判了“上帝造人”的谬论,并为恩格斯进一步总结人类起源问题提供了科学基础。

但是,猿是怎样演化成人的?达尔文学派的自然科学家,没有也不可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相反,当他们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就充分暴露了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性。

二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的本质在于社会性。因此,只有充分了解人的社会本质,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才有可能揭示人类产生的规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108页)人类社会各个时期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为解决人类起源问题提供了钥匙。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社会成员间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正如格恩斯的说的:“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

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477页)正是从这样的基本观点出发,恩格斯创造性地揭示了从猿到人转变过程的关键所在——劳动。

恩格斯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自然辩证法》149页)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人类的手就是在创造和使用工具中得以产生的,由于劳动,从古猿前肢发展出来的人手,“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自然辩证法》150页)通过长期劳动,古猿的前肢被改造成了人的手,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正如恩格斯所说:“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自然辩证法》150页)赫胥黎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中曾把人的手脚和动物的四肢进行了比较,并得出结论说:“在身体结构的任何部分,还找不出比手或脚更适于说明事实真相,即人和猿类之间的构造差异,不如猿类和猴类之间的差异大。”他强调人与动物在结构上的共同性,证明人与猿之间只有亲缘关系,而没有看到本质的差别。这样的比较是不全面的,他完全忽视了经过劳动而形成和完善起来的人手和类人猿的“手”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差别”,即使“骨节和筋肉的数目和一般排列,在两种手中是相同的,然而即使最低级的野蛮人的手,也能做几百种为任何猿手所模仿不了的动作。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粗笨的石刀”。(《自然辩证法》150页)

在劳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逐渐发生了相互交往的关系,集体劳动的活动,要互相协作,这就使得人们产生了彼此交换意见和经验的需要。“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自然辩证法》152页)正是由于生产劳动的需要,古猿的发音器官在不断地使用中得到改造,而终于变成人类的发音器官。使猿类的简单呼叫,逐步发展成为人类的有音节的语言。恩格斯说:“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自然辩证法》152页)达尔文试图根据他对动物叫声的观察,来解释语言的发生,例如他认为原始人类发出的呼喊,就好像鸟类在求偶时的鸣叫一样。显然他混淆了人类语言与动物鸣叫的差别,没有看到语言的社会本质。离开人们的社会劳动是无法对语言的产生作出正确的解释的。恩格斯指出:“动物之间,甚至在高度发展的动物之间,彼此要传达的东西也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相传达出来。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一种动物感觉到不能说或不能听懂人的语言是一种缺陷。”(《自然辩证法》152页)和动物不同,人们的语言是人类社会劳动活动的产物,是在生产物质财富的社会劳动中,由于相互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人类的脑子也同样是劳动的产物。恩格斯明确地指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自然辩证法》153页)

大脑是思维的器官,思维是大脑的机能。恩格斯认为原始人类思维的产生是和他们的生产活动以及语言的产生密切相联系的。人的思维就像语言一样,一开始就是社会劳动活动基础上的产物。人在劳动实践中要不断认识事物和交流思想,因而使大脑的思维能力发展起来,同时脑子与思维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自然辩证法》153页)人类所特有的抽象思维能力,以及人所特有的自觉能动性,都是在社会性的生产劳动中获得的,它与动物的精神能力是有着本质差别。达尔文学派的自然科学家不懂得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决定作用,所以他们看不到人与动物的本质差别。赫胥黎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中就认为:“从大脑构造来讲,可以明显看到,人同黑猩猩或猩猩的差

别比它们和猴类的差别还要小, 人脑和黑猩猩脑之间的差别与黑猩猩脑和狐猴脑之间的差别相比, 几乎是微不足道的。”接着他进一步阐述了这种观点, 他说: “企图从心理上上来区别人和兽, 也同样是徒劳的”。达尔文也同样坚持这种看法, 他在《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中, 虽然对人类与低等动物之间的精神能力作了比较, 但最后仍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说: “尽管人跟动物在心理上的差别很大, 但是那差别是程度上的差别, 而不是种类的差别”。达尔文学派的自然科学家把人降低到动物水平, 只有到人类和动物所共有的智力, 而看不到人类的特有的辩证的思维。恩格斯说: “如果说动物不断地影响它周围的环境, 那末, 这是无意地发生的, 而且对于动物本身来说是偶然的事情。但是人离开动物愈远, 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自然辩证法》157页)

人类能够有意识, 有目的地依靠劳动去改造自然, 支配自然, 使自然界为自己服务, 而动物只能消极地适应自然, 靠自然界中现成的东西维持生存。这便是人同动物的根本区别。总之, 劳动创造了人, 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也在于劳动。

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作指导, 科学地阐明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不仅肯定了人与动物的亲缘关系, 指出“人也是由分化产生的”, (《自然辩证法》18页) 是从古猿演化来的, 而且指出, 正是由于社会性的生产劳动, 才使猿转变为人, 才使人类从动物界脱离出来, 而成为人。

劳动创造人的科学论断, 阐明了人类的起源, 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科学基础, 为人类起源问题的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近百年来, 中国和世界各地许多从猿到人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化石, 和原始人使用过的劳动工具的发现, 完全证实了恩格斯论断的无比正确。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是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写成的。是批判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锐利武器, 它充满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战斗精神。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正是资本主义由盛变衰, 无产阶级从登上政治舞台到逐步壮大时期。各国资产阶级受到“巴黎公社”革命打击之后, 已深深感到自己的统治不是那么稳固了, 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统治, 他们挖空心思地寻找各种反动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 妄图以此来麻痹革命人民的斗争意志。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 庸俗唯物主义者毕希纳、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朗格之流, 大肆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即把仅仅适用于生物界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学说机械地搬到人类社会中来, 用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人降到一般动物的水平, 混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否定人的社会性、阶级性, 抹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其目的就在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破坏无产阶级革命。因此, 批判这种反动思潮, 是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项战斗任务。早在1870年, 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 就无情的批判了朗格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他说: “朗格先生有一个伟大的发现: 全部历史可以纳入一个唯一的伟大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就是……, ‘即生存斗争’ 这一句话 (达尔文的说法这样应用就变成了一句空话), 而这句话的内容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律, 或者更确切些说, 人口过剩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2卷 671—672页)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把“生存斗争”的理论从生物界搬到人类历史领域中来, 硬说这种理论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 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

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潮,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一光

辉文献中,进一步从理论上揭露和批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按照劳动创造人的理论,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同时也使猿群进化到人类社会。社会性的劳动生产决定了人类的本质不同于动物。“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自然辩证法》158页)人类社会和动物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们各自具有根本不同的发展规律,“因此,把动物社会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在这里——在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的情况下——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完全不能应用了。”(《自然辩证法》284页)人脱离动物界以后,生存斗争停止了,替代它的是生产斗争和社会斗争。在阶级社会中,就是阶级斗争。劳动创造人的理论有力地回击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谬论。

达尔文学派的自然科学家,由于阶级的局限,他们的社会历史观是唯心的。因此看不到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恩格斯当年就明确地指出了达尔文学派自然科学家在人类起源问题上所受到的世界观的局限。他说:“**甚至达尔文学派的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学家们还弄不清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因为他们在唯心主义的影响下,没有认识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自然辩证法》156页)正因为这样,赫胥黎、海克尔等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都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甚至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鼓吹者,大反社会主义。海克尔在咒骂社会主义时就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平等,而达尔文主义却证明这种平等是不可能的。能生活下去的只是少数最强壮,最能适应的个体。公开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辩护。正如恩格斯所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自然辩证法》187页)

一百年前恩格斯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家的批判,不是也很适合于今天那些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指导的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吗?科学史上的事实表明,那些妄想摆脱哲学支配的自然科学家,他们“**完全作了哲学的奴隶,遗憾的是大多数都作了最坏的哲学的奴隶**”。(《自然辩证法》187页)任何自然科学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就无法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以至陷入唯心主义泥坑。这对我们每个革命者来说,也是很好的教训。每个革命的同志,都“**应该作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作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信徒,也就是说应当作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列宁全集》33卷204页)

三

恩格斯在人类起源的研究中,彻底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围绕着人类起源和发展问题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息过,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争夺自然科学这块阵地,歪曲利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为他们的反动统治服务。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期望在雇佣奴隶制的社会里有公正的科学,正象期望在应不应该用减少资本利润来增加工人工资的问题上有公正的工厂主一样愚蠢可笑**”。(《列宁全集》19卷1页)某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硬将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和大腿骨分割开来,说什么大腿骨代表着一种较进步的人,头骨代表一种原始人;头骨是原始人被作为猎获物而留下来的。企图以此证明人类自古以来,就如同动物界一样,互相吞食,互相残杀。这显然是在为他们贩卖“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种族主义泡制“科学”根据。

反动统治阶级, 从来就是“上智下愚”、“天才论”和“种族主义”的狂热鼓吹者。在中国, 春秋时候反动思想学孔丘, 就认为有所谓“生而知之”的“圣人”, 还胡说什么“上智”和“下愚”是不可改变的。这种反动理论一直成为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 古希腊的反动奴隶主贵族哲学家柏拉图声称, 才智是天赋的, 人是天生不平等的, 具有哲学家才能的奴隶主贵族应当成为永久的统治者。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 更是采取歪曲利用自然科学的手段, 披着科学的外衣, 贩卖这种唯心史观。毕希纳利用所谓生理学材料说什么“一切属于上等级的人, 都比较从事体力劳动的低微阶级, 有更宽阔的头脑”, “黑人的脑更像动物的脑”, 公然为种族主义制造反动理论根据。他还认为人类可以依照头脑的丰富与贫乏区分为有教养者与无教养者, 这种区分可以按照生物的遗传规律一代代地传下去。而且有教养者统治无教养者也是永恒不变的, 是符合生物学规律的。

臭名昭著的英国生物学家高尔敦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反动理论, 他所宣扬的“优生学”还提出过所谓人类天赋才能的等级“理论”。胡说什么劳动人民是“生理上劣等的”、“智力平庸的”, 而资产阶级却是“生理上最优秀的民族精华”。他竭力宣扬种族主义, 说什么白种人盎格鲁-撒克逊族是居于优等第一, 而黑人是最下等。并且认为人类文明进步, 医学的发展, 以及战争等会妨碍“优胜劣败”淘汰“劣等人”和繁殖“优等人”的自然选择过程, 要引起人种退化, 所以他提出要“改良人种”。

剥削阶级所宣扬的这些反动理论, 首先第一条, 就是否定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 (《自然辩证法》149页) 否认劳动创造世界, 否定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推动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归功于少数“天才”人物的“天赋才能”。恩格斯深刻地指出, “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 归功于脑髓的发展和活动”, (《自然辩证法》156页) 正是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根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才能决不是先天就存在的, 而是来自实践。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 人类特有的能够思维的大脑, 并不是上帝赐予的, 而是在劳动的推动下, 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形成的。人的知识、才能、智慧, 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剥削阶级宣扬“上智下愚”, “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等反动谬论, 目的就是为了欺骗劳动人民, 使人们相信“剥削有理”, “压迫有理”的谎言。就是把剥削者说成是“天生的聪明”, 把劳动人民说成是“天生的愚笨”。认为阶级的划分是神的意志决定的, 或者说是“生存竞争”的结果, 是所谓永恒不变的法则。以此作为阻止人民革命的精神枷锁, 作为维护其反动统治的理论工具。

今天, 苏修叛徒集团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为了推行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他们也极力利用自然科学这块阵地, 制造反革命舆论。近几年来, 苏修御用学者为了适应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反革命政治需要, 打着所谓科学研究的招牌, 大肆贩卖“生理天赋论”, “天才复制论”等唯心主义货色。胡说什么“现在存在着一种伟大的生物学等级, 这种生物学的等级, 按其多级性来讲, 并不亚于、甚至还可能超过社会所制约的等级”, “人与人之间的生物学上的不平等是多么的巨大。”还说什么只要用生物学上的方法就可以“改良人种的本质”, “控制人的生物学以及借此来控制人的心理的新方法, 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人类的伟大财富, 成为改造人体及其精神的武器。”¹⁾ 他们甚至利令智昏地说什么只要“理智的应用生物学的发现, 能够在人类社会

1) R. C. 约利什, “是生物的还是社会的”, 原载苏联《哲学问题》, 1969年, 第3期。

的进步中导致全球的成功。”¹⁾

还鼓吹“种族优秀论”，胡说什么俄罗斯民族“在任何时代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比它更伟大的人类性格”。这些并不是什么新玩意，而是千百年来剥削阶级所宣扬的“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的翻版。

苏修叛徒集团重新捡起这种破烂货，其目的就是企图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用所谓生物学规律来掩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为它对内残酷剥削、镇压劳动人民，对外推行新沙皇的霸权主义的反动政治目的服务。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阶级对国内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扩张和掠夺，必然激起国内外人民的强烈反抗。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百年前，社会达尔文主义没有能够阻挡无产阶级的胜利进军。今天，生物学的药方也同样是挽救不了苏修叛徒集团的灭亡。恩格斯于一百年前就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一光辉文献中，庄严宣告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阶级斗争，这一阶级斗争，只能以资产阶级的崩溃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而告终。**”（《自然辩证法》160页）可以肯定，人们看到的决不是苏修叛徒集团所谓改造人种本质的“成功”，而将是无产阶级彻底战胜资产阶级的伟大胜利！

以上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事实，充分说明了科学不是与阶级斗争无关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起源的理论，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对人类起源理论的研究，为我们树立了为革命研究科学的光辉榜样。《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一革命文献，至今仍然是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批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向反动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

1) 涅法赫，“核移植——新的可能性”，原载苏联《文学报》，1969年，第31期。